

貧困單親媽媽的觀察筆記— 生命歷程中的角色與生存心態的解釋^(註 1)



王篤強

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以英美乃至歐陸為首的福利改革大致上走向工作福利（workfare）或積極性政策（active policy）的方向。在這個潮流底下，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無論在輿論上或是在政策上都成為關注的對象。然而，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的研究，在目前文獻中主要分從個人、結構和生命歷程的觀點出發。這些說法儘管都揭示了有工作未就業現象的某些重要面向，但基本上也都站在單一的立場來研究這個問題，有著要不缺乏同時兼融個人與結構、再不指出了動態歷程卻未說明時間對性格養成的理論盲點。本文將借用生命歷程觀點，站在理性選擇和角色觀點出發，從有工作能力未就業的貧困單親媽媽與社會救助制度環境互動過程來分析他們選擇就業或不就業的行動邏輯，試圖打破目前對貧困者行為理解的偏狹，希望為日後研究提供思路。

壹、有工作能力未就業的界定與問題出現的脈絡

一、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的界定、本文指涉對象、與資料的出處

（一）有工作能力未就業的界定

在社會政策領域中「有工作能力未就業」一詞可以區分成二個部份理解。前者所謂「有工作能力」依社會救助法第 5 條之 3，指 16 歲以上，未滿 65 歲，並且沒有 1.25 歲以下仍在國內就讀空中大學、大學院校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遠距教學以外學校，致不能工作。2.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3.罹患嚴重傷、病，必須 3 個月以上之治療或療養致不能工作。4.因照顧特定身心障礙或罹患特定病症且不能自理生活之共同生活或受扶養親屬，致不能工作。（依本款規定主張無工作能力者，同一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以 1 人為限。）5.獨自扶養 6 歲以下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致不能工作。6.婦女懷胎 6 個月以上至分娩後 2 個月內，致不能工作；或懷胎期間經醫師

診斷不宜工作。7.受監護宣告等七項情形中任一類型者。

而後者「未就業」的解釋，目前相關法規並沒有直接的界定。但是，如果我們參考主計處（2012）「就業（指在調查資料標準週（每月含 15 日該週）內，年滿 15 歲，從事有酬工作、或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稱之）」；和「失業（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 15 歲同時具有無工作、隨時可以工作、正在尋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者，乃至等待恢復工作者及找到職業而未開始工作亦無報酬者也包含在內）」的界定之後，我們大致上可以這麼說，「未就業」不等同於「失業」，它所含涉的內容更為廣泛；它除扣除就業者之外，還包含失業、怯志工作者、以及想工作未找工作、或因其他原因未工作也未找工作的非勞動力人口。

（二）本文所指涉對象：貧困單親媽媽

基於上述，所謂「有工作能力未就業」所指涉的是，不具備社會救助法 5 條 3 身分的失業、怯志工作者、以及想工作未找工作、或因其他原因未工作也未找工作的非勞動力人口。這些人不容易在失業統計中見到，也不易反映在服務方案的輸送與設計之中，我們有必要關注。此外，也由於這類人口組成複雜，未就業原因也各有不同。為求指涉對象較為清楚起見，在本文中，我們先把對象鎖定在前述中低收入戶人口中有工作能力但未能就業的單親媽媽。

（三）本文資料的出處

本文觀點出自對有工作能力未就業單親媽媽訪談時的筆記，以及這段時間的想法。之所以採取觀察筆記這種文體，主要基於想觸及主題以及希望含蓋範圍不要過窄，討論篇幅不宜過大，所以省略諸多對話，期待直指所欲表達的整體概念所致。至於，它的資料主要來自 2012 年「中低收入戶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促進就業服務研究」深入訪談的意見。在該研究中，我們藉由在全臺辦理焦點團體的機會，於團體進結束後進一步邀請典型成員進行深入訪談。在結束研究後，我們反覆參看逐字記錄並且對照研究筆記，針對其中 8 位單親媽媽的說法以及觀察筆記，綜合提出本文的觀點。這些有工作能力未就業的貧困單親媽媽，平均年齡大致上在 31 歲上下，高中職教育水準，有 1-2 位幼年子女，身體罹患或曾患特殊疾病，目前離婚或未婚者居多。

二、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議題出現的脈絡

「工作福利」或稱「積極性政策」是促使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受到關注的主因。在過去十餘年間，已開發國家的社會救助政策已經從不帶資格限制、強調權利的做法走向關切義務並附帶工作要求的取向。這種要求受助者以工作換取福利並搭配「棍子與蘿蔔」的取向統稱為「積極性政策」（Gilbert and Van Voorhis, 2001; Esping-Andersen et al., 2002; Trickey and Lødemel, 2001；王永慈，2007；王篤強，

2007)。

臺灣依據社會救助法第 15 條，以及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第 1 項第 5 款，對有工作能力未就業的低收入戶分別由社會行政與勞工行政部門負有資格審核、以工代賑，以及提供就業服務、職業訓練等服務。如果他們不願接受這些服務措施，或接受後不願工作者，主管機關具有不予扶助的權力。不過，以上規定在現有福利供給上一方面受制於政府所能扶助者，無論在範圍上或是內容上極為有限；再方面也受制於充斥人情影響專業判斷的鄉民社會脈絡，能嚴格落實取消救助資格者也相當有限；三方面，除了前述二者外，基於行政職能劃分的緣故，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要進入勞政部門接受服務，服務使用者具有工作意願是重要的要件，而要如何確定具有工作意願、以及一旦進入勞動體系接受服務後又如何鞏固其就業意願則又涉及社政部門的工作，因此雙方無論從一開始的案源確認、服務進行中彼此協調合作機制、雙方服務內容的搭配、乃至結案之後相關社會支持的保證上，還有許多尚待精進的空間。而綜合上述三個有限，構成了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議題在臺灣出現的背景和脈絡。

貳、有工作能力未就業現象的解釋與批駁

有工作能力者為什麼不就業、乃至因此引發出來有關工作倫理、福利依賴議題的爭論始終是社會救助史爭議的所在。各

家因為立場不同，而對就業阻礙的原因有著各自不同的解釋（Bashir, N. et al., 2011）。而這些說法大致上從貧窮研究以及更具體的就業阻礙研究中延伸而來。他們大致上是針對工作福利（workfare）方案，如「貧困家庭暫時性救助計劃（TANF）」的參與者在參與過程中所遭遇困難的檢視；在對象上則以單親媽媽、困難個案、或弱勢求職者等人為主要的對象。他們預設未就業與貧窮現象彼此相關聯，而之所以如此則可區分成偏重個人態度和動機的解釋、著眼於貧窮文化、福利形成反工作誘因與依賴、缺乏人力資本、導因勞動市場分層、都市內城產業區位遷移、乃至生命歷程等講法（王永慈，2005；呂朝賢，2007；呂朝賢、陳柯玫與王德睦，2011）。而這些具體反應在各式各樣的就業阻礙相關的研究成果上。

一、與個人有關的說法

其中，包含了個人態度、動機、健康情形（如重大傷病、精神疾病、憂鬱、物質濫用、正在接受治療）、家戶暴力、受虐、人力資本在內與個人及能力（缺乏學歷）有關的說法。在這個說法中，認為個人內在諸如健康等事實及懶散、依賴、道德薄弱等態度或動機；即便有心但缺乏職場所需各種工作技能與經驗；以及混雜前述因失業、家暴、受扶養人口數過多、無法延宕滿足、不良工作習慣等特質所形成代代相傳的「貧窮文化」；再加上外在豐厚的福利給付讓他們有恃無恐並構成了反工作誘因是服務使用者不工作或不就業的理由

(Danzinger & Seefeldt, 2002; Stapleton & Burkhauser, 2003; Perkins & Nelms, 2004)。

二、偏向結構的解釋

上述的說法，大抵偏向個別行動者的行為解釋，受到不少批評。例如，態度、動機、乃至貧窮文化無法區分這是貧困者所獨有；而加強個人資本又失之於產業結構遷移所帶來的失業。因此，另派說法從結構取向出發，論稱貧困者不是不工作而是他們要不是在勞動市場分化過程中位居底層；再不就是因為都內城產業區位外移，迫使他們想要工作卻找不到、或即便找得到工作也依然窮困；還有外在的交通、托育、社會網絡支持系統缺乏，受到各種包含例如性別、犯罪前科、種族等歧視也限制了他們工作的意願（Danzinger & Seefeldt, 2002; Stapleton & Burkhauser, 2003; Perkins & Nelms, 2004; Anderson, Halter & Gryzlak, 2004）。換言之，這是非戰之罪，是結構乃至制度配套不足所造成的困境。

三、生命歷程的觀點

當然，結構的講法有助於我們支持反對「責備受害人」的觀點；然而這個取向過偏結構的結果，始終存在著忽略個人主體性、把人化約成結構條件下的產物，以及在實務操作上緩不濟急等問題。也因此，面對個人與結構的對立，有加以綜合的必要。生命歷程（life course）的觀點，恰恰為天下不歸楊（個人）即歸墨（結構）的立場，提出同時含攝二者復歸中道的看

法。

生命歷程觀從生命史中重大的生命事件出發，研究長期的貧窮動態。它看重家庭如何針對家戶經濟情況（household economy），發展出屬於他們家戶所共有的資源使用、資源分配、以及促進家庭經濟福祉的家庭經濟策略（Dewilde, 2003）。在這個觀點底下，結構和理性選擇論點被結合在一起，人受結構約制的同時也給了人主動開拓的力量；它把家庭和個人的貧窮，放回相關脈絡後，不但找出他們的因應策略，也指出策略執行上的機會和限制（Moen & Wethington, 1992）。透過，明白指出窮人是天生的策略性行動者，具有克服貧窮處境（Leisering, 2003; Leisering & Leibfried, 2000），並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動的能力。生命歷程觀突顯了主要家計負責人在「收入（所得大於需求）」與「支出（戶內人口變化造成需求高於所得）」事件影響下，面對老、幼、離婚、死亡、意外、失業……等事件時容易落入貧窮。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工作或就業與否在這個觀點下，各種阻礙就業的因素，恰恰是行動者考量生命歷程中，因應相關事件中結構與個人因素後，所做出的因應與選擇的結果。

參、策略性行動者的角色行為與生存心態

面對前述三大類有工作能力未就業的解釋，我們認為生命歷程說，特別是對本文主要關切的貧困單親有工作能力就未就業的媽媽，就宣稱作為變遷專業的社會工

作而言，具有重要的實務意涵。因為，當我們把貧困者視為策略性的行動者時，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之所以就業或不工作的行為是行動者慎思熟慮，既考量個人也考量環境之後策略性選擇的結果。而這種策略性的選擇結果，無論自主選擇或為環所迫，除了反應現實生存所需之外，它也隱含著學習仿效得來以及透過學習仿效也可以產生學習遷移（transfer of learning）的意涵。經由這個思路，社會工作介入方法將可以在關鍵重大生命事件中，取得更為具體的施力點。不過可惜的是，生命歷程觀點雖然突出了貧困者既考量自身又考量環境主體性，和指出影響家庭濟地位變動的收支事件左右前述選擇的部份；但它對具體生存策略，也就是行為本身和長此以往所造成的影響，似乎缺乏進一步的說明。對此，我們認為可以透過引入角色與生存心態（habitus）概念為之補充。

一、角色是行為的載體，有工作能力未就業的貧困單親媽媽扮演了親職照顧者、生計工作者、與策略性求助者三大主要角色

行為（behavior）是人們一切有目的的活動，由一系列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動作所構成。它既受到個體內在認知、情感、興趣、願望、需要、動機、理想、信念和價值觀等左右，也受外在客觀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影響（Myers, 2012）。以變遷媒介（change agent）自許的社會工作者，不但關心行為，更致力於行為的變遷。如果我們從這個理路出發，特別是當我們

把包含了認知、情感、乃至意圖在內的態度具體化到角色載體時，探究角色如何扮演、角色如何選擇離開，將牽動社會工作者對案主乃至我們自身行為的理解和變遷。換言之，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其「未就業」的行為，在這個理路下，它是行動者既考量自身，又考量環境之後，在這個社會大舞臺上角色選擇的結果。

一般來說，「角色」指與社會位置相關的一組屬性與期待。它是社會參與者事先所預有的認同（Winship & Mandel 1983）；它同時也是種符合社會行為要求的期望或腳本（Bates & Harvey 1975, Zurcher 1983 轉引自 Myers, 2002）。其展現受與期待（包含規則、法規、規範等）相聯的獎賞與懲罰所強化；其辨視則可以透過與期待相左而被視為障礙的各種歸因所清楚的觀察。

據此，我們從前述個人、結構、與生命歷程的就業障礙研究中，有工作能力未就業的貧困單親媽媽們，大致上可以歸結出「帶著病人角色孤立少援的親職照顧者」、「處於勞動市場邊緣受到各種限制的生計工作者」以及「有著多重阻礙與多元需求的策略性求助者」三大角色。這些角色更精確地說可以用角色組（role set）來表達，它是與一個特殊地位為中心有關的一系列相關角色的總和。為了行文方便，我們用最主要的角色來命名並說明。

（一）帶著病人角色孤立少援的親職照顧者（簡稱親職照顧者）

首先，之所以說病人角色，主要反應在具有身體重大傷病、精神疾病、憂鬱、

物質濫用、正在接受治療等健康問題；而稱孤立少援則是針對單親、受暴、受虐、缺少非正式社會支持網絡的特性；至於親職照顧者則從需要照顧傷病子女、家人或需陪伴幼年子女而來。以上三種特性，有時單獨出現，有時共同聯合出現，它在質與量上組成了求助者最基本的特質。其中，作為孤立少援的病人角色最是突顯。通常病人角色傾向把自己定位成弱者，而且極需要相關專業人員關懷和幫助；這個期待不單反應在對助人者角色的期待上，也反應在社會以及他們更關注助人者義務是否履行。另外，由於罹病未必能夠全然歸咎於個人，也因此可以據以要求免除全部或部分社會責任（Armstrong, 1989）。而這點再加上反應在媒體形象塑造上、受文化所贊許（或起碼無法苛責）的親職（通常母職要比父職要來得多）將更形明顯。

（二）處於勞動市場邊緣受到各種限制的生計工作者（簡稱生計工作者）

再者，所謂「處於勞動市場邊緣受到各種限制的生計工作者」，主要著眼他們學歷不高，缺乏工作經驗和工作技能，主要集中在次級產業（服務業）易受景氣波動影響的現象；同時也指涉他們受到包含缺乏交通工具、犯罪前科、精神障礙歧視、與居住地域缺乏工作機會等結構限制的特性。依據前述，一方面作為事實，前述結構限制的確就影響了就業的可能性；再方面這些限制也倒過頭來左右了行為者對於自己的期望，乃至降低了自我效能。它類似於前述病人角色，作為生計工作者已經

或曾經辛勤謀衣謀食，努力養家活口的同時，由於過錯在於社會，相對剝削感強烈，也期望社會代理人與相關部門，回復其應得的權益或免除部份的義務。

（三）有著多重阻礙與多元需求的策略性求助者（簡稱求助者）

最後，由於他們的就業阻礙與需求並非單一的，往往是多重而且多元，需要社會工作者及相關部門介入。但由於在不同生命歷程各種事件中有著各種不同的介入需求，作為求助者的福利使用者非但不是全然被動接受相關人員的給予，其求助者角色的扮演會隨著時間的長短、以及生命事件而發展出不同的因應能力。其中具體細節，我們下節細說。但這提醒著，在每一個不同階段之中，作為行為者本身的陳述與行動、手段與目的、表層與內在，如何混同使用或區別看待；作為求助者與助人者之間的互動策略，特別是文化策略（人情工具化），如何發動、如何成為行動框架，專業關係彼此分寸如何拿捏才符合專業角色的要求，相當值得我們深思。而對此，無論是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我們認為他們是有著「多重阻礙與多元需求下的策略性求助者」。

當然，之所以提出上述，主要目的在說明來自於前述角色下行為扮演的腳本，在不同階段中不同的反應是符合理性的，同時也是與我們所在社會互動建構產出的。既然是具備合理性的、並且是與我們所處大環境所互動建構產出的，那麼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在當前所被在意的行為將

可以獲得同情的理解，我們也因此無須「責備受害人」。而這也指出了日後拆解與重構的方向。

二、角色衝突與其消弭：親職照顧者與生計工作者的矛盾和策略性求助者的作用

以上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三項主要角色中的前二項，「親職照顧者」與「生計工作者」在我們觀察裡有著嚴重的角色衝突。而這是行為者選擇不就業（無論是在意圖上或是行為上）的重要理由。所謂角色衝突指的是當一個人扮演一個角色或同時扮演多個角色時，無法勝任，所造成的矛盾和衝突。例如一個人要同時擔任親職照顧者成為可以回應幼童需求的媽媽與使命必達完成公司任務的生計工作者之間，既要肩負著照顧家人的責任，又要配合雇主加班的要求，結果在時間和空間上產生了矛盾，很難兩全。另外，因此所產生的角色負荷過重，也造成惡化健康的壓力。

面對前述，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為了生計，往往先向非正式社會網絡資源求助直到彈盡援絕、或原有非正式支持體系已經支應無力之後，或主動或被迫，轉而進入正式福利體系中成為求助者。在這個正式的由公私部門所協力構成的福利科層與民間福利體系中，為了調解親職照顧與工作生計衝突，求助者們試圖努力符合受助資格以便順利取得生存資源，逐步長出如何能夠獲取幫助的策略性行為。

具體地說，面對需求，特別是相應的各種福利給付，在扮演求助者角色的初

期，經歷離婚、重病（憂鬱、精障、複合多重障礙）、喪親（配偶、子女）、意外、天災、失業、入獄、.....事件，在當下相應的技巧、能力、公私部門福利的資訊、正式和非正式的管道還未掌握清楚；四處碰壁、左支右絀，生活還沒有發展出一套因應與處理問題模式。慌亂、焦慮，困擾、懊惱，生活失序，個體認知受嚴重威脅是常見的心理狀態。而在此時，物質濫用、身心健康危機、孤立退縮或者再求助是常見到的現象（Caplan, 1964 轉引曾華源，2012）。但到了逐漸適應這項新角色的中期，扮演這項角色的時間加長，相較於初期，他們已從各種挫折、與和各方（正式、非正式助人體系與同儕）打交道的經驗中，學習到如何主動的蒐羅、比較、甄別不同助人對象的期待（例如曉得帶有宗教團體色彩者在施善過程中期待『教化』（接受該所屬宗教的價值、或皈依投入該教）；而在手法上，不管是透過直間接的關說請託、無計可施之後訴諸以情緒、乃至綜合前述不害怕丟臉、不放棄任何可能的機會、「一試再試」，逐步發展出各種『辦交涉』的能力。而這些作為大致上是利害損益衡量之後的結果（Wang et. al., 2015）。最後，求助者角色發展到後期，前述各種技術已然精熟，而且熟悉各種生存之道；即使總體資源並不豐富，但生活在其中已經不再慌亂，清楚各種滋養物的位置，以及生存對手或競爭者的策略，並且從中發展出因應之道。原有的理由，或就業的障礙，儘管表面上一樣，但背後的意義也逐步轉化。

而這一點對本文所關切的有工作能力未就業的貧困單親媽媽「為什麼不就業」提問的回答，饒富意義。這些策略性的行為反應綜合起來說就表現在「**如何最起碼保持現有條件，既要增加收益，但又不喪失福利資格**」的生計衡量上。而這項衡量，既包含求助者清楚取得福利資格相關規定的認知上；也包含具有把目的轉化成相關行動的能力上。在英美文獻中，諸如福利依賴、福利欺騙，乃至華人文化中攀關係套交情等人情相關策略運用，一般而言都是這個脈絡框架下的產物。而在我們訪談中也發現，貧困單親媽媽為化解親職照顧者與生計工作者彼此的角色衝突策略，整理如下：(一)尋找高彈性能配合自己及家人時間需求的工作，以便兼顧子女上下學、家人或自己就診復健和醫療的時間、或因應突發臨時請假的狀況、或不受上下班限制只要在家就可以營業...等工作；(二)刻意爭取有實質收益，但不列入所得計算的工作，如不開立收據的攤販、日薪臨時工、網路銷售業者、與從事其他灰色經濟工作（上網代練、租借人頭、.....）...。而從事這類工作，除了避免福利資格被取消外，還有規避銀行債務的好處；(三)即便選擇從事全職工作，也會計算因此新增諸如托育或看護成本...後的實質收益，與不工作領取福利的差額和投入時間與心

力。而綜合這些都是影響受助者選擇就不就業的可能原因。

然而，在勞動市場上，能符合前述條件的工作，要不是屬於次級勞動市場的職業，其薪資、相關職業福利保障較低；再不就是為數甚少，而且一旦受到盤剝無法受到法令保障。總之，沒有一定福利資格認知能力的求助者找不到領取福利的門檻；而擁有認知能力進入門檻以後，卻不具備操作取得資格能力的求助者也無法取得所須資源。即便擁有上述，結構環境中到底有多少這類工作機會，再再都是關鍵。

但從前述之上，或許我們可以這麼來理解，求助者選擇不就業核心是就業阻礙與生計衡量之後對於損益利害綜合判斷的結果（見圖 1）。也因此，就業阻礙研究中所表現出來的種種無法就業的原因是「表」；生計衡量過程中求助者所珍視的損益利害是「裡」。表與裡之間、虛和實之間，未必具有因和果的直線關係；消滅或消滅了就業阻礙這個表面的因，未必就會產生就業的行為。更何況，有工作未就業的貧困單親媽媽選擇就業與否的行為，放回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互動過程的生態中，有可能既是表影響裡、裡影響表，更是表裡虛實、彼此相依。只有務實，不天真的將二者綜合看待，才能真切地理解我們所關切的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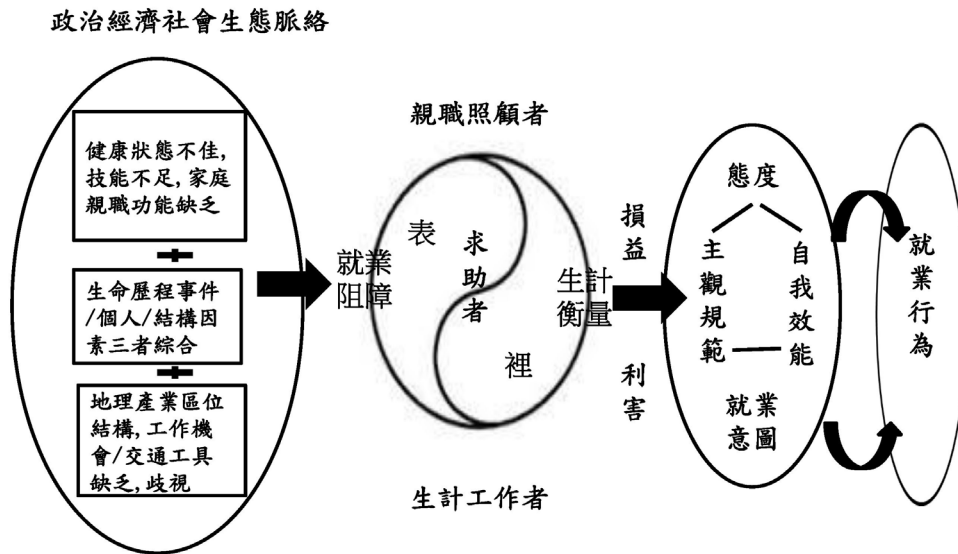


圖 1 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多重就業阻礙，多重角色表裡行為及就業簡圖

而作為照顧者、生計工作者與策略性求助者的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貧困單親媽媽們所負載、所扮演的角色，在這樣的觀點底下，既是現實勞動市場結構以及個人內外就業阻礙彼此催逼模塑出來的結果，也同時是自我角色選擇的結果。它的選擇與退出，一方面與社會化、學習、仿效有關；再方面則是社會獎懲等利害的計算。前者構成了行動者的策略；後者影響著行動者的決斷。而作為選擇，包含行動者行為策略與決斷，依據「計劃行為論」的主要說法（Ajzen, 1985），它起碼在行為意圖上又與我想不想、別人怎麼看、做不做得到的態度（對行為正負向評價）、知覺（對重要他人或團體執行該行為之社會壓力）、以及自我控制（對成功執行行為所須相關機會和資源掌握程度的預判，即自我效能）相聯繫。當然，以上透過角色、以及計劃行

為論對於行為或其意圖的理解或預測仍然有其局限，例如在實際生活中影響行動者行為選擇所發生的生態場域、以及而被行為科學歸類進「決策黑箱」的非關理性的情緒、乃至受文化甚或潛意識等部份，在這裡被忽略了。但透過目前所掌握的這些，仍然將有助我們決定實務處遇的重點方向。

三、行為的持續：生態場域中的生存心態養成和變化

不過，從我們的訪談和與實務工作者接觸經驗中發現，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作為策略性求助者這項角色，其能力的取得與他自身過去所在的位置和相關角色經驗的內化有關之外；角色扮演時間的長短和所占據的位置，對於行動者問題認知與生存策略的選擇也有影響。換言之，角色扮

演的技巧與能力、占據的角色位置，乃至更重要的因此形成的心理傾向或氣質，有可能因為次數的加多、時間的增長而使相應技巧在越發精熟之際；隨著經年累月，入戲太久而入戲太深，進而讓依附在角色上的種種作為，由外入裡、從短期暫時權宜求存之計，變成固著甚至難以擺脫的狀態，直到對外在環境的認知與動機改變為止（見圖 2）。而這一點，我們很可以從 Bourdieu 對於日常生活言行實踐中有關「生存心態(habitus)」的說法，得到解釋。在這裡所謂「生存心態(habitus)」，

是種持續性的氣質稟性(disposition)或傾向。在 Bourdieu 概念中，它一方面來自個人先賦的，由過去家庭、所處階級、所受教育社會化的結果，將預先影響著行動者的認知、感覺、做事及思考的偏向態度；再方面這種內化了的傾向，除了賦予行為意義之外，也會隨行動者所經過的社會歷程而重新建構。它受到行動者所有的資本(capital)(包含數量、結構)、場域(field)二個概念一起共同被 Bourdieu 用來解釋行動者據以行為的理據（高宣揚，1991；劉維公，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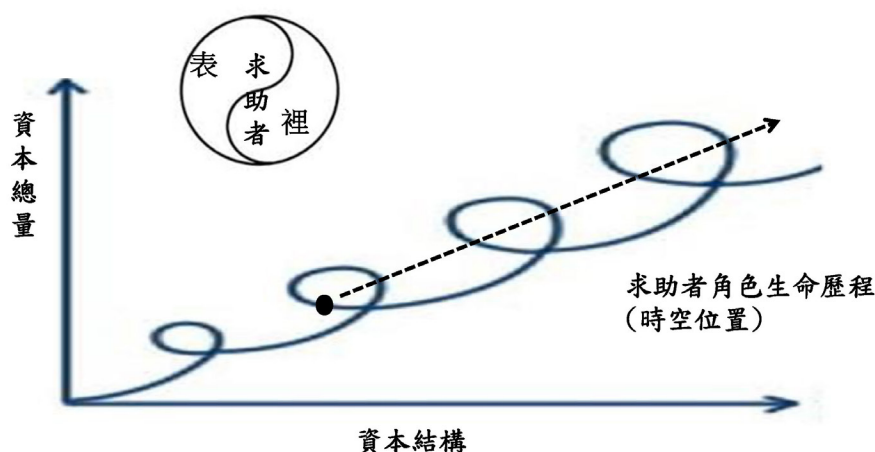


圖 2 策略性行動者生存心態的變遷

以有工作能力未就業的中低收入戶貧困單親媽媽所扮演策略性求助者這個角色為例，之所以選擇使用隱匿收入的策略，它是在我們目前這個特定場域(field)底下的產物。在臺灣當前的福利場域中，一方面囿於現有相關福利供給種類不足、數量有限（如健保費及學雜費部份減免）、很

難嚴格要求據實申報；再方面涉及福利科層或因人力有限查處成本過高、或因確有自由裁量空間，製造了可乘之機（如人情關說管用、不嚐試便得不到基於各種原因而來的資格放寬機會）；三方面或有例可尋、或來自社會同情弱勢、公部門受制媒體輿情，這些共同構成了使隱匿成為可能

或成本降低的空間。

至於手法技巧或出自自己過去經驗內化的機敏；還有成為此一場域一份子後，來自同為低收入戶的朋輩口耳相傳仿效，甚或民意代表、基層福利科層官僚教導。凡此種種，不會出現在求助者角色扮演的初期；它在取得求助者角色的中後期容易出現。特別是長時間扮演求助者角色之後，無論從推理上或從經驗上，我們很難否認時間積累對於個人所造成影響的面向。

因此，如果說，真有所謂「職業窮人」或「貧窮文化」應當放在這個理路下理解。更何況，為謀生存，在所在場域中調節個人與外在環境，或有意或無意承繼過去內化經驗及後天因占據角色新學來因應技巧所共同形成的生存心態，不管是貧困單親媽媽或其他低收入戶在這一點上與一般人恐怕並沒有什麼差異。這是無分貧富，人所共同有的通性。只不過，這種作為生存心態的通性，在一般人身上，因其所處位置，所擁有的各種資本的數量、乃至結構，被包裝的或被表現的更加符合社會文化中『優雅』的期待（因為有長期儲備而可以更有身段地進行交換）。相較之下，喪失話語權的窮人，在直接面臨，一件件、不間斷的生存威脅時，對於追求資源以滿足自身乃至家人需求的手法只能赤裸裸地直截了當，他們各種受到批評或訕笑的行為，無非一方面是沒有本錢（資本）虛耗、再方面也未必具有講究身段的技能，三方面在主流社會受到歧視之下，而被特別放大檢視或看待的結果。

肆、代結論：生命歷程中角色與生存心態的解釋與意涵及行為變遷的方向

綜合前述，在本文中，我們試圖透過對於中低收入戶單親媽媽深入訪談的觀察筆記勾勒出有工作能力未就業的理由，並指出在背後有著作為「帶著病人角色孤立少援的親職照顧者」與「處於勞動市場邊緣受到各種限制的生計工作者」的角色衝突，以及透過「有著多重阻礙與多元需求的策略性求助者」的角色試圖調解上述二者衝突的努力。再者，我們針對策略性求助者角色的扮演，還進一步指出隱藏在決策過程中，被表達出來的諸種就業障礙、和存在於內心之中的生計衡量，它們互為表裡，互有虛實複雜的動態面貌。此外，我們也指出此種策略性角色的扮演，在行動者生命歷程中所處場域，以及來自內外、目前及過去所擁有資本數量與結構下，除了產生短期求生存的效果之外，在長期也將構成生存心態，它影響單親媽媽的思想言行，以及選不選擇就業的行為。接下來，我們要試著回應，提出上述看法對實務工作者而言產生什麼樣的好處，它可能為我帶來什麼理論上的幫助。對於這個部份，我們分從底下幾個部份說明。

一、行動者的行為必須放在場域中理解

這項陳述最起碼包含底下幾層意思：其一是接受服務的案主或服務使用者，在本文中是中低收入戶有工作能力未就業的

單親媽媽，他們的行為反應出與他們互動各造（社會、社會工作、社會服務組織）的社會期待，而這些期待落實在各種角色的扮演上（在本文中是親職照顧者、生計工作者、與策略性求助者）。之所以選擇扮演某個角色（角色取得）或不扮演某個角色（角色退出），在本質上是綜合考量後理性自利的結果，與行動者所處的場域（生態系統）以及在場域之中隨時間積累而改變的社會位置，以及行動者本身的所攜帶的資本，乃至源出前述資本但卻又綜合考量場域變化所形成的生存心態有關。其二是，不唯求助者如此理解。作為助人者的主要代表—社會工作者、乃至整個社會工作所置身的體系，其中行動者（可以是個人、群體、社會各部門）的行為也可以如此理解。我們透過上述的理解，將不單有助於改善受精神分析病理學傳統影響下社會工作者過度偏重以個人肇因理解行為的毛病；也可以矯正重視社會結構忽略個人主體性，同時在操作上緩不濟急的問題。讓社會工作「人在環境中」的說法，也在理論上得到支持。

二、行動者行為的理由與目的，在不同階段中有著動態的變化，必須靈活評估。

在社會工作甚或社會科學中，透過因果關係的假定，消滅或者抑制因的發生常是取得果的重要依據，但透過此處我們行動者表面主述的理由和內在的狀況綜合起來觀察，在每一個階段中的因和果不見得一致。也因此，社會工作者進行處遇時，

有必要時時留意評量因和果的動態變化，尋求處遇介入最佳的途徑。而透過如此理解，也將有助社會工作者在實務操作上，更加動態的從內外理解服務使用者；使社會工作者不致陷入專業價值要求「不要責備受害人」，但在實務中卻又常譴責受害人的認知衝突與道德矛盾。而這正常是新手社會工作者學用不一、價值混淆、乃至專業崩熬的重要來源。

三、助人者對於受助者行為變遷選介入方向

變遷是社會工作專業的核心，但從經驗觀察中，改變常與所受壓力的大小有關；甚或常常只在生死交關之際產生。沒有足夠大的生存壓力，人很難改變；一旦壓力相對變小，人的改變力度也就趨緩甚或停滯，直到下一次壓力來臨帶來失衡後，再一次發動改變的循環。也因此，如何在壓力最大時進行介入，如何在壓力稍降之後，鞏固求助及變遷的意願，非常重要。在我們這份觀察筆記中，一方面告訴我們包含個人所擁有的資本、所處的場域、以及前述二者加上時間所構成的生存心態是可能的重要變遷方向；變遷作用的標的是作為求助者在不同階段中所反應出來的策略性的角色行為；而具體操作則可從服務使用者對行為變遷的態度，經由重要他人、成功角色模範、乃至立即有感的獎懲機制作用等主觀規範，和自我效能的增強等三方面固化行動者的意圖。而這些，我們可以參考社會工作處遇方法中有關個人行為、與環境變遷術的說明。

四、分別對待時間對角色扮演精熟程度的影響，選用不同處遇策略

我們再從生存心態以及造成生存心態的時間面向來說，則對介入有工作能力未就業的貧困媽媽的時間點，很是重要。例如，剛剛落入社會救助行列的服務用者，正處於求助初期階段，相關的策略性行為還沒有被發展出來，同時服務使用者在心態上也最需要協助，行為上也最容易在誘因機制的安排下進行變遷。我們認為無論對本人或是其家庭成員來說，這是介入處遇的最佳時機。如果能夠把握，生存心態的養成就有可能朝社會期待的方向發展。

然而，一旦進入中期之後，由於服務使用者已經逐漸開始適應資源相對匱乏的生活模式，慢慢逐步擺脫初期困窘不適應，並且也摸索並發展出因應方法。在這個階段中，相較於前期，行動者的行為將更具自主性，更熟悉需要何種以及如何取得外界的幫助。但相較於後期，由於行動者行為尚未固化形成慣性，仍然具有變化的潛力。也因此，提供正向的角色模範、

同輩網絡，增進因應技巧、和提高自我效能感的作為會是重要的努力方向。

不過經年累月到了後期成為職業受助者後，清楚生態環境各種滋養物的位置，也學會了相應的技巧並且占領了可以更富厚滋養物的位置（即利基 niche），相應下生態心存也隨之固化。助人者對此，在誘因機制推力與拉力的設計上需要更加密細的規劃；在助人工作的技巧上，除了對各種細節的計算要比求助者更清楚之外，否則行為很難產生預期的改變。

綜合上述幾點，我們認為可以更立體、更豐富的認識在同一場域中活動、玩著同一套遊戲規則的服務使用者；甚或包含社會、社會服務機構、乃至作為社會工作者的我們。藉此從中擬出更動態、靈活的服務策略，提升服務的成效。

（本文作者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關鍵詞：中低收入單親媽媽、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工作福利、角色、生存心態

附表、深度訪談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LSM-01	LSM-02	LSM-03	LSM-04	LSM-05	LSM-06	LSM-07	LSM-08
年齡	32	41	29	44	33	34	32	42
教育	專科	高中	高職 (肄業)	專科	專科	專科 (進修中)	高職	高職
婚姻	離婚	家暴分居	家暴離婚	離婚	分居	家暴離婚	未婚	離婚
健康	地中海型貧血	精神疾病	良好	高血壓/胃潰瘍	家暴、憂鬱	車禍肩腰傷	良好	工傷、輕度身障
子女 (年齡)	1女(8) 1子(5)	2女(13、7)	1女(5)	1子(14)	1女(13) 1子(10)	1子(17) 2女(16、13)	1子(3)	2女(17、16)，1子(5)

編號	LSM-01	LSM-02	LSM-03	LSM-04	LSM-05	LSM-06	LSM-07	LSM-08
子女 狀況	過動症/管 教需求	管教需求	腦性麻痺/ 托育需求	管教需求	早期療育 需求	聽力受損/ 管教需求	早期療育 需求	早期療育 需求
傷病 家人	重度失能 老年母親			中度失能 老年母親		輕度失能 老年父親		
工作 現況	臨時清潔 工	臨時雜工	臨時兼職 照服員	無業	臨時雜工	兼職工作	售貨員	臨時清潔 工、攤販
債務		債務					卡債	卡債

註 釋

註 1：本文若干構想草成於 2015 年兩岸社會福利論壇－高齡化社會的應對及挑戰研討會，當時承蒙簡春安教授、孫健忠教授與曾華源教授深入討論並提供寶貴意見，為此衷心致謝。當然，文中若有思慮不周或闡述不清，文責由作者自負。

參考文獻

- 王永慈（2005）。臺灣的貧窮問題：相關研究的檢視。臺大社工學刊，10，1-54。
- 王篤強（2007）。新貧與激活：當代社會救助政策發展方向與能力取向的闡釋。社區發展季刊，116，123-141。
- 呂朝賢（2007）。貧窮動態及其成因：從生命週期到生命歷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14，167-210。
- 高宣揚（1991）。論布爾迪厄的「生存心態」概念。思與言，29(3)，21-72。
- 陳柯玫、王德睦、與呂朝賢（2011）。致貧生命事件與家庭因應策略之探究：從接案到初訪記錄之內容分析。弘光學報，63，65-80。
- 曾華源（2012）。危機介入取向之社會工作模式。在宋麗玉主編社會工作理論，第六章。臺北：洪葉。185-215。
- 劉維公（1999）。布爾迪厄與生活風格社會學研究：兼論現代社會中的社會學危機。社會理論學報，2(2)，347-374。
- Anderson, S., Halter, A. and Gryzlak, B. (2004). Difficulties after leaving TANF: Inner-city women talk about reasons for returning to welfare, Social Work, 49(2), 185-95.
- Armstrong D (1989). An Outline of Sociology as Applied to Medicine, Wright: London.
- Bashir, N., Crisp, R., Gore, T., Reeve, K., Robinson, D., (2011). Families and work: Revisiting barriers to employment,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2015 年 5 月 15 日取自

- <http://research.dwp.gov.uk/asd/asd5/rrs-index.asp>
- Danziger, S.K. and Seefeldt, K.S. (2002). Barriers to employment and the 'hard to serve': Implications for services, sanctions, and time limits. *Focus*, 22(1), 76-82.
- Dewilde, C. (2003). A Life-Course Perspective on Social Exclusion and Pover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4(1), 109-128.
- Esping-Andersen, G., Gallie, D. Hemerijck, and A. Myles, J. (2002). *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lbert, N. and Van Voorhis, R. (2001). *Activating the Unemployed: A Comparative Appraisal of Work-Oriented Policies*, Rutgers.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Leisering, L., and Leibfried, S. (2000). *Time and Poverty in Western Welfare States: United Germany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isering, L. (2003). The Two Uses of Dynamic Poverty Research-Deterministic and Contingent Models of Individual Poverty Caree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i-bielefeld.de/soz/personen/Leisering/veroeffentlichung_dt.html.
- Myers, D.G. (2012). *Social Psychology* (11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Moen, P., & Wethington, E. (1992). The Concept of Family Adaptive Strateg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8, 233-251.
- Perkins, D. & Nelms, L. (2004). Assisting the most disadvantaged job seekers, in E Carlson (ed.) *A future that works: economics, employ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Centre of Full Employment and Equity,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 Stapleton, D. C. and Burkhauser, R.V. (2003). Contrasting the employment of single mothers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Employment Research*, 10(3), 3-6.
- Trickey, H. and Lødemel, I. (2001). *An offer you cant Refuse: workfar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ristol: Policy press.
- Wang, D.C. , Tsui, M.S., and Pak, C.M. (2015). Renq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Behaviour Analysis of Low Income Qualification.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in press).
- Winship, C. and M.J. Mandel (1983). Roles and positions: A critique and extension of the blockmodeling approach, in: S. Leinhardt (ed.)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83-1984*.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